

給他們一個選擇的自由。以色列同意這項難民問題需要解決，但是，却拒絕了無限制的遣返觀念。它更認為，大批阿拉伯人的湧入，一則將構成以色列安全上的危險，二則將改變以色列的本質。

自一九六七年「六日戰」後，在難民營裏生出的年青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紛紛參加巴勒斯坦游擊組織，目的在於收復失土，重建一個民主巴勒斯坦國。正因為這一原因而反對埃及、約旦接納美國之中東和平談判建議。

以色列政府爲了安撫約旦河西岸六十萬巴勒斯坦民心，而解除自東岸的巴勒斯坦游擊隊的威脅，曾試圖給予巴勒斯坦居民一個自治機會；可是，由於對以色列意向的懷疑；更由於顧慮約旦政府及游擊隊領袖們的反對，西岸阿拉伯領袖便拒絕了以色列的計劃。（註十三）

據最近貝魯特阿拉伯外交界消息，約旦國王胡笙已提議由巴勒斯坦人參加任何中東的談判。他更建議組成「巴勒斯坦解放陣線」（Palestine Liberation Front），並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出席在賈林主持下的和談。他相信有很多巴勒斯坦人會接受基於安理會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決議案而使以色列自佔領區撤退。胡笙也準備給予巴勒斯坦人的自治權，一旦西岸的失土收復；但被巴勒斯坦游擊隊所拒絕。（註十四）

南美洲之城市暴亂組織

壹

自由世界的研究國際政治者，對於南美洲國家的城市暴亂組織（註一），莫不予以密切的注意。拉丁美洲的城市暴亂組織，原是以中美洲瓜地馬拉之若干謀殺與綁架事件（註二）爲其嚆矢。近年來，這種組織，幾乎已經遍及南美洲的每一個國家。其恐怖行動之駭人聽聞者，可得簡述如下：

阿根廷的城市暴亂組織，不下五六個之多。每一暴亂組織的人數，雖不過數百名，但是，他們彼此之間，聯繫甚切。他們都以一九五五年被推翻的獨裁者貝隆 Juan Peron 爲號召。其中一個組織，稱爲「雇用鎗手」Montenaros（“hired guns”）者，即綁架並殺害前總統阿朗布魯 Pedro Aramburo。

南美洲之城市暴亂組織

六 結語

這三項基本問題，無論用何種方式尋求解決，都無法使得以，阿雙方滿意，而構成中東問題的死結。因此，中東前途，從短程看，尚可苟安一時；從長程看，戰爭是恐怕難以避免的。正如尼克森所云：中東危局，恰如二次世界大戰的巴爾幹火藥庫一樣。

- 註一：The New York Times, Dec. 22, 1969. 註二：Ibid, Nov. 7, 1969. 註三：中央社華盛頓九月一日合衆國際電。註四：美聯社貝魯特十二月二十三日電。註五：Newsweek, Oct. 5, 1970. By George W. Ball. 註六：合衆社開羅十二月十九日電。註七：合衆社開羅十二月廿三日電。註八：合衆社開羅十二月十九日電。註九：美聯社大馬士革十一月十四日電。註十：據約旦政府估計，約有七百五十人死亡，一千二百五十人負傷。註十一：U.S. News & World Report, Dec. 21, 1970. 註十二：Ibid. 註十三：The New York Times, A Palestinian Solution, Oct. 5, 1970. 註十四：The Muslim World, Karachi, Dec. 19, 1970, P. 3.

（一九七〇、十一、廿七脫稿）

雷 崧 生

burnu。貝隆現住西班牙的馬德里，流亡歐洲已十五年。目前，阿根廷總統勒溫斯頓 Roberto Levingston 將軍，擬邀請貝隆返國，以爲釜底抽薪之計。

巴西於一九六四年建立軍人政權以後，共產黨頗有瓦解的形勢。接着，便出現了城市暴亂組織。他們攻擊警察局與軍營，炸毀公共建築物，搶劫銀行，綁架實業家、政治家、與外國使節，幾乎無所不爲。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內，殺害四十餘人，傷兩百餘人。一九六九年九月，美國大使埃魯布利克 C. Burke Elbrick 被綁架，以巴西政府釋放十五名被捕之恐怖分子，而獲得生還。這次的交換，使南美洲各國的城市暴亂組織，均了然於少數人的恐怖行爲，即足以使強有力的政府就範，因而羣起效尤。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瑞士大使布克 Giovanni Enrico Bucher 復爲所謂人民革命先

鋒隊 Popular Revolutionary Vanguard (VPR) 所綁架，截至本文執筆時為止，尚未獲釋。

智利的革命左派運動 MIR，亦為不惜採取恐怖手段的暴亂團體。它目前雖然參加新總統艾耶德Salvador Allende 的人民統一黨，似乎取得了可尊敬的政黨地位，但是，這種合作的能否持久維持，不無疑問。

烏拉圭的城市暴動組織，稱為「杜巴瑪羅派」Tupamaros。這個名稱是縮寫印第安革命領袖杜巴克·阿瑪拉Tupac Amara 的姓名而成。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對抗西班牙王國而企圖建立新國家的革命分子，曾一度自稱為「杜巴瑪羅派」(註三)。現在，這個名稱又再度地為烏拉圭的城市暴亂組織所採用。該派約有三千人，以劫富濟貧為掩飾，搶劫珠寶店與銀行，綁架勒索，獲得鉅額的贖金。一九六九年八月，他們綁架美籍警察顧問密屈利恩 Daniel Mirione，欲交換被捕之恐怖分子一百五十人，為烏拉圭政府所拒絕，竟予以殺害。目前，他們仍然綁架着巴西領事狄亞士 Aloysio Mares Dias Gomide 與美國農業專家佛萊 Clande Fly，尚在勒索之中。玻利維亞的城市暴亂組織，是一九六七年十月，古巴共黨蓋瓦拉 Che Guevara 被擊斃以後，由山區轉入城市的剩餘遊擊分子，現在仍甚猖獗(註四)。

此外，其他南美洲國家，幾乎都有城市暴亂組織的恐怖行為，未遑一一敘及。至於中美洲國家的城市暴亂組織，不在本文的範圍以內。但是，本文關於南美洲國家的討論，亦可或多或少地適用於中美洲國家。

貳

南美洲，乃至於整個的拉丁美洲，一直是國際共產黨所欲攫取的對象。

近年來各地蜂起的城市暴亂組織，自是以各種不同的程度，隸屬於共產黨的發縱指示之下。但是，南美洲的共產黨，極為複雜。普通所謂俄共與毛共的類分，不足以說明其全部的情形。卡斯楚Fidel Castro 派、蓋瓦拉派、與瑪利蓋拉Carlos Marighella 派，均曾發生很重大的影響。一九五九年，卡斯楚在古巴奪得政權以後，古巴曾是「輸出革命」的主要淵源。後來，蓋瓦拉幾乎絕裾而去，重返南美洲，想建立另一個「革命基地」。這是卡斯楚與蓋瓦拉分歧的明朗化。瑪利蓋拉曾任巴西的國會議員，隸共產黨籍。他提供了

恐怖行為的典範。他雖然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遇伏被殺，其策略普遍地為南美洲的城市暴亂組織所服膺，所執行。

共產黨的革命行動，應當從城市開始，抑應當從鄉村或山區開始，一直為其內部各派所爭辯，因而有不同的行動方案。一九一七年，俄國的蘇維埃革命，始於彼得格勒，由城市擴大到鄉村。一九二七年以後，毛共曾效法蘇俄，在若干城市製造暴動，結果失敗，改從鄉村與山區開始。一九五九年，古巴卡斯楚的遊擊隊，由山區進據城市，攫取政權。蓋瓦拉在卡斯楚對於「革命輸出」，漸失興趣以後，想在南美洲國家重演卡斯楚式的革命。卡斯楚的獲得古巴政權，大部分是由於當時總統巴蒂士達Fulgencio Batista 的不積極抵抗。但是，南美洲國家，却不是這樣地垂手可得。蓋瓦拉終被擊斃。於是，南美洲各地的遊擊隊，鑒於蓋瓦拉的失敗，由鄉村與山區，相繼轉入城市，成為恐怖性質的暴亂組織，如上所述。

俄共以正統派的姿態，往往斥南美洲城市暴亂組織的恐怖行為，是浪漫主義、虛無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智利的共產黨，即與革命左派運動，貌合神離。蘇俄政府的官方立場，主張漸進政策，不支持遊擊隊。智利新總統不諱言其為馬克斯主義者，而竟獲當選，被視為蘇俄政策的成功。但是，城市暴亂組織的恐怖行為，亦有其來自俄共的悠久傳統。本世紀初，史達林即擡高加索的銀行與郵局，以資助列寧，實為其最早的例證。

瑪利蓋拉為城市暴亂組織的理論家。他寫作了一本「城市遊擊隊手冊」Minimmanual of the Urban Guerrillas，僅五十五頁。他的主張，可歸納如下：(一)人口稠密的城市，遠較鄉村易於中傷，極便於施展恐怖手段，予以懾伏。(二)藏匿於城市的人海之中，亦遠較不信任陌生人的鄉村為易。(三)恐怖手段包括濫殺、搶劫、綁架勒索與交換等等。(四)恐怖工具包括一切軍器、瓶、磚、與可投擲之物等等。南美洲國家均列為禁書。美國的嬉痞團體與黑權團體，油印予以流傳。

智利最近在其首都的一個廣場上，建立蓋瓦拉的雕像。該雕像的座基上，鐫有瑪利蓋拉的圖形。在南美洲共黨、馬克斯主義者、與恐怖組織的心目中，瑪利蓋拉是僅次於蓋瓦拉的第二名「殉道者」。

南美洲的國家，傳統地有三種安定的力量，即天主教會（註五）、地主階級、與軍人。但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三種力量的保守與溫和的成分，漸趨減弱；近三十年，尤其是如此。就天主教教會說，全世界的天主教，正醞釀着重大的改革，南美洲的教會，自然亦難例外。教士往往出身於寒素的家庭。他們目擊着一般人民的貧苦生活，不免懷抱着投身政治，以救世救人的觀念，而容易為偏激的思想所滲透。智利新總統艾耶德所領導的人民統一黨，即包括左傾的教士在內。教會的高級領袖，固然不予以禁止，實際上亦無法予以禁止。他們自己也往往與執政政府，對抗甚烈，巴西即其一例。就地主階級說，南美洲的若干國家，曾推行一些初步的土地改革政策，並且戮力於多元化的經濟。前一政策的效果，是使地主階級所掌握的土地，漸趨減少。後一政策的效果，直接地是使生產範式脫離單元的經濟，間接地是使地主以其資本，轉而投資實業，成為企業家。他們一方面形成資本階級，另一方面在美國的投資競爭之下，成為反美的所謂民族工業家。其子弟肄業國內外大學，又往往輸入激烈的思想。最後，就軍人說，軍人的來源，與上述教士的來源相似。何況南美洲的軍人，干涉政治者遠多於置身事外者。阿根廷即其顯明的例證。一二國家的軍人，如智利的軍人，却避免干涉政治。最近，智利的陸軍總司令史奈德 René Schneider 被刺，據說是右傾分子不滿意於其坐視馬克斯主義艾耶德將當選總統的激烈行動。尼克森總統曾派遣紐約州州長洛克菲勒 Nelson Rockefeller，訪問南美，提出報告，作決定南美政策的參考。洛克菲勒主張扶助南美洲國家的所謂「新派軍人」。但是，軍人干政的結果，總是不能持平，當於下文論列。

南美洲國家的政治，從六〇年代的中葉起，即趨於兩極化。所謂兩極化，指不流於極右，即偏於極左而言。軍人干涉政治者，亦為這種潮流所激盪。流於極右者，可以舉阿根廷、巴西、厄瓜多爾、與巴拉圭為代表。其中阿根廷與巴西，為軍人執政。偏於極左者，可以舉玻利維亞、智利、與祕魯為代表。其中玻利維亞與祕魯，為軍人執政。美國故總統甘迺迪，倡導「進步同盟」，曾寄望於拉丁美洲的溫和民主政府的建立，作政治與社會的改革。現在，除聞哥倫比亞與烏拉圭的政府，堪稱為保守的政府而外，其他南美洲國家的政府，都可以說是既不民主，又不溫和。「進步同盟」顯然地未獲致其預期的效果。

以上種種，或為南美洲城市暴亂組織的前因，或為其後果。總之，南美洲的有關政府，迄未克採取有效的應付辦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九日，美洲國家組織，在巴西的申請之下，決定於一九七一年一月間，召開外交部長會議，討論所謂「政治綁架」問題。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歐洲會議 Council of Europe 的部長委員會，鑒於西德駐西班牙聖西巴斯蒂安 San Sebastian 名譽領事柏魯 Eugen Behl 與瑞士駐巴西大使布克之被綁架（註六），也通過決議，宣稱外交官之被綁架，是「嚴重地違反了最神聖的國際傳統」，促請其十七個會員國，檢討其現行國內法，是否已有充分的保護外交官的安全措施，已有嚴厲懲治綁架者的法律，並且採取國際間的密切合作辦法，以保障外交官的安全。美國政府的構想，是在促成一種國際公約的簽訂，規定幾個條款如下：（一）締約國將不庇護綁架者。（二）締約國拒絕釋放罪犯，或支付贖金，以滿足綁架者的要求。（三）締約國將不加壓力於綁架發生地的國家，使其忍受極為不利的條件，從事於被綁架的外交官的拯救。換言之，綁架發生地的國家，對於拯救被綁架的外交官，應採取與拯救其本國人民，並無不同的手段與方式。

晚近，城市暴亂組織已經由拉丁美洲，蔓延到加拿大（註七）與西班牙諸國。誠如紐約時報所評論的，這無異乎是一種「國際疾病」。這種疾病的診治，遠較規模事件為難。國際組織的嚴厲譴責與主要國家的締約倡議，都不是治本之道。

（註一）美英雜誌稱之為「城市遊擊隊」Urban Guerrillas。（註二）例如一九六八年六月，瓜地馬拉之「叛亂武裝部隊」FAR，殺害美國大使梅恩 John Gordon Mein。一九七〇年二月，綁架外交部長傅恩德 Alberto Fuentes Mohr。四月，殺害西德大使史勃勒蒂 Karl von Sprei。（註三）參閱本刊第九卷第九期王建勛：烏拉圭共黨與烏國的城市暴亂。（註四）參閱本刊第十卷第一期王建勛：玻利維亞政局的過去與現在。（註五）南美洲人民信奉天主教者，達百分之九十。（註六）柏魯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為西班牙之巴斯克 Basque 分裂運動者所綁架。布克事件見本文第一段。（註七）魁北克解放陣線 Quebec Liberation Front (FLQ) 綁架英國駐蒙特里貿易專員克洛士 James R. Cross 凡六十日。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以綁架者之遣往古巴為交換條件而獲釋。該陣線曾綁架魁北克勞工部長拉博特 Pierre Laporte，於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七日予以殺害。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日脫稿